

UNFINISHED DIALOGUE

未完的对话

Isaiah Berlin, Beata Polanowska-Pygulska

[英国] 以赛亚·伯林 [波兰] 贝阿塔·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 著

杨德友 译

刘东·主编 彭刚·副主编

 译林出版社

HUMANITIES AND SOCIETY

UNFINISHED DIALOGUE

未完的对话

Isaiah Berlin, Beata Polanowska-Pygulska

[英国] 以赛亚·伯林 [波兰] 贝阿塔·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 著

杨德友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未完的对话 / (英) 伯林 (Berlin, I), (波) 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著;
杨德友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3

(人文与社会译丛)

书名原文: Unfinished Dialogue

ISBN 978-7-5447-4673-1

I. ①未… II. ①伯… ②波… ③杨… III. ①政治哲学-文集 IV. ①D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72486号

Unfinished Dialogue by Isaiah Berlin and Beata Polanowska-Sygułska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Prometheus Books.
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 LL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2-27号

书 名 未完的对话
作 者 [英国] 以赛亚·伯林 [波兰] 贝阿塔·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
译 者 杨德友
责任编辑 马爱新
原文出版 Prometheus Books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12.125
插 页 2
字 数 288千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673-1
定 价 3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主 编 的 话

刘 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围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译作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象，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译林出版社提议出版《未完的对话》的中文版，此举令我十分惊喜。得知这一决定的时刻，促使我回忆起这部著作缘起的一系列往事。

记忆犹新的是，1986年夏天，在牛津大学全灵学院，我于忐忑不安之中和以赛亚·伯林爵士的初次会见，从此开始了我精神生活中最重大的经历。结果是，这部著作竟在美国出版，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得以送到中国读者手中！曾几何时，我的想象力范围似乎容纳不下事实发展的这一过程，尤其是在我所生活的境遇之中。

从那一时期起，世界发生了巨变。1989年6月4日，在波兰举行了第一次几近完备的民主选举，此举开始了整个东方集团的深刻变革。当时的超级大国之一轰然垮塌，另外一个则似乎正在经历衰落，而世界的重心显然正在向中国移动，中国正在成长为世界强国。正因为如此，近年来我一直建议我的学生学习汉语。在见证正在出现的种种过程的开端之时，作出回顾是十分值得的。孔子曰：“温故而知新。”

伯林的著名论文《两种自由概念》，我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得悉的——1981年波兰宣布军管后不久。显而易见，在当时，自由乃是涉及我个人的问题。我还记得在阅读这篇文章时所经历的精神上的巨大轻松感，那种感觉酷似在充满新鲜氧气的森林中漫步。但是，阅读当

时克拉科夫全市唯一的一本《两种自由概念》绝非易事。这一著名论文的单行本，列入了我所在的大学的藏书。为了借阅，我必须提出相应的申请，说明需要阅读这一本禁书的理由，和图书馆馆长约谈，申述情由。在当时，大学乃是有限的自由飞地。我是以科学研究人员的资格得允借阅该书的。在那些年代里，在波兰，伯林的著作无法公开借阅。伯林某些著作的波兰语译本只有“地下”版本，或者国外波兰侨民主办的出版社版本。我属于很少数人的小组，这少数人因为所在的单位，而可以合法地借出伯林著作的有限藏书。《两种自由概念》对我触动至深。我十分喜爱的一句箴言“Nawet najczarniejsza chmura ma srebrne brzegi”（至黑乌云，亦有银边）最形象地表明元气开始恢复，希望突然来临。这令我全神贯注进入对伯林的思考。直接的效果就是，我鼓起勇气，给牛津大学的这位思想家写出第一封信。他主动开始了我们后来的书信往来和个人交往。

1989年巨变之后，在波兰公开地大量出版了伯林著作的译本。现在，在波兰图书市场上，几乎可以买到他全部的著作。感谢本书中文版译者提供的信息，我得知，中国读者已经能够阅读伯林重要论著的译本（12部）。我为此感到高兴。就我个人经验而言，在深刻变化的时期，是值得从《两种自由概念》作者的著作中汲取思想的。他涉及个人自由的言说永远不会失去重要意义，虽然在稳定的时期不一定显得突出。与此同时，他的价值多元论见解越来越发出强有力的声音，成为充满多样性与相互碰撞、互不相同的生活方式在这个世界中的路标。这样，在我经历的日益变迁的历史环境中，我起初对伯林自由概念的着迷，逐渐演变成为对于他在道德哲学中所开创的新潮流——道德多元论的强烈兴趣。这在1989年的巨变之后，在对于我的这位导师的哲学思考的探索中，又一次得到了培育。

当然，现在冒昧献给中国读者的这部著作的中心任务是以赛亚·伯林，以及他对思想遗产的贡献、他对世界和人类事务的深刻观

察力——这一切都一如既往地得到了他个人的经验的多方面启迪。而在我们的书信和谈话中，也写进了我的祖国波兰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时期的事态。同时也记录了我个人生活、我遇到的困难和重重困惑的片段。在1983年至1997年巨变时期我们展开的讨论如果给读者带来启发或者成为希望的开端，我将感到十分欣慰。我深信，以赛亚·伯林也会有同样的感受的。

中国人民和波兰人民相同的苦难已经成为遗产。警示从这种积淀中汲取，但是，积淀已经成为过去而一去不返。

附记：我想要真诚感谢本书译者杨德友教授，感谢他全力以赴完成这一译事，和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展开的富有成果的通信联系。我感到十分惊异的是，杨德友教授也懂得波兰语（翻译出版过不少波兰语的著作）。对于波兰语言和文化的熟悉，在翻译《未完的对话》过程中，肯定等于有了一张王牌。我希望，杨德友教授有机会翻译出更多的波兰作者的著作。我以往的好运给我带来的和以赛亚·伯林特殊接触的机会，正在继续带来成果。最近的幸事就是和杨德友教授的思想交流，达到了通畅的理解。

贝阿塔·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

波兰，克拉科夫市，雅盖沃大学

2012年8月12日

序 言

亨利·哈代

以赛亚·伯林和贝阿塔·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之间出色的对话，是在伯林生前最后的十四年期间断断续续地进行的。他们二位交流的一些记录有时候令人欣喜，有时候令人沮丧，现在以书面形式发表，针对伯林思想的探索，这乃是一个突出的贡献。对话也带有两位对话者个性的鲜明印记，并且直接而感人地表明，卓有成效地对待道德和政治的问题是一件感性与争论兼而有之的事。

贝阿塔在共产党执政的波兰长大成人。共产党治下的生活给政治思想带来一种特殊的迫切性和不容忽视的重要性，这是很多西欧人难以理解的。伯林儿童时期目击了俄国 1917 年的革命，对这一点很有体会；实际上，他自己主要的思想关注，有几项都大体上是受到对一切形式的极权主义的极度反感所驱使，是早期的经历把这种反感永久地留在他的内心。和敏感、智慧，而且直接体会了对自由的严厉镇压的人士谈话，对于他来说，是特别畅快的，所以他总是努力接待那些把他的思想视为一条生命线，视为对于虚伪意识形态的解毒剂的人——这些人曾被迫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之中。贝阿塔就是这样的人：1997 年 4 月，她在给伯林的信中写道：“对于居住在我们这一部分世界的人来说，自

由论的哲学基础问题十分重要。”^①在以后的一个月里她又写道：

问题本身依然萦绕我的脑际；特别是在我们国家激烈的政治 8
话语语境下（恰巧明天在波兰要举行宪法公投）。自由民主的国家制度是我们唯一的理性选择吗，或者，我们还有其他同样合理的选择？如果没有，那又是为什么？是因为（像约翰·格雷可能说的）我们特殊的历史传统吗？或者，因为自由主义有理由要求普遍性的权威，因为它承认自由的价值，没有自由就没有选择，因而不可能保持我们所理解的人性？^②

伯林의思想和贝阿塔在波兰所面临的现实政治问题之间的直接联系，对于他来说，给他们的讨论带来了特殊的重要意义，这一点他不止一次在书信和谈话中表明。这一点也使得他们的对话活跃了起来。

这一联系也解释了贝阿塔为何决定写出博士论文（1988年完成），专论关于自由概念的争论，特别参考伯林的思想。旋即，她提出问题，对话就这样开始——她说，在1983年以书信方式，后来在1986年有机会面谈。论文完成之后，贝阿塔开始构思一本论伯林的自由哲学的专著，她的询问一直延续到伯林逝世（专著在1998年问世）。她问的都是核心的、探索性的问题，伯林在1986年的一封信里承认：“请相信我，从您提出的十分尖锐的问题中，我受益良多。我想，您是我遇到的最好的（口头）评论者，而且最具建设性。”^③

贝阿塔在觉得没有按照她所需要的方式得到回答的时候，是继续坚持己见的。她的顽强是非常值得赞扬的。凡是郑重尝试请求伯林口头述明他的理念的人都熟悉，要竭力让他守住正题，以克服他坠入闲

① 第90页（注释中的页码为原书页码，见本书边码，下同）。

② 参见以下第94页。

③ 参见以下第50页。

篇的倾向，那些闲篇虽然常常趣味横生，却使得他离开了对话者想要关注的议题。特别在开始的时候，贝阿塔感到敬畏、羞怯，而且对自己尚未经受考验的英语也没有把握，但是，她勇敢地坚守了自己的要务，尽管伯林像蜻蜓一样对各个题目一个一个地点到为止，常常只顾自己随意点拨而不是她的需求，在她竭尽全力要表达想要让他回答的问题的时候，打断她的语句。这样磕磕绊绊令人烦恼的交流都被编辑理顺，技巧高超，但是我见过原稿，我目睹了编辑室地板上撒满的删节段落和语句的纸屑。

- 贝阿塔一直保持了和伯林的通讯，这是值得庆幸的，因为伯林的
- 9 书信比他的谈话更为集中和可靠。其中有些是对于他的观点透彻明晰的叙述，有时候比他已经发表的著作中对同一主题的叙述更加清楚。实际上，其中有一封论人性之概念的书信，出于这个原因，在2004年的《纽约书评》上发表。贝阿塔也写了一定数量的文章论述伯林的思想，其中有些收入本书（和后来的一些文章一起）。她曾把这些文章的草稿给伯林浏览，和他讨论，这样的做法激励了伯林在她认为有必要加以解释的地方为自己作出了解释。这些文章无疑将推进对于他们提出的问题做进一步的讨论。尤其是最后的一篇，提炼了贝阿塔和伯林就多元论和自由主义之间关系展开的交流的结果；这个问题将会多次提及，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随着这个主题的发展，这是一个重要的讨论。

贝阿塔的主要论题是自由，但是，像近年来的许多学者一样，她也受到价值多元论的挑战和吸引^①，伯林把这种多元论和他的自由主义连结了起来，虽然连结的性质是有争议的。的确，她要澄清“这一联

① 论纲是：人的各种终极价值观（为其本身，而不是作为某种更高的目的之手段而追求的那些），作为客观的经验观察，彼此是截然不同的；从此可以推论，哲学价值观不能在某种所谓更高层次的价值，例如实用性的尺度上彼此比较，或者（换一个说法）被转化为某种共同的通用价值。出于这种“不可比性”，进而得知，在真实情况下，如果互不相容的价值观发生冲突，则在其间作出的决定将会引发出有时候是悲剧性的损失——从遭到反对的，或者不受重视的价值来看，就是如此。

系到底是什么”的愿望乃是她和伯林谈话的引导性主题之一。是多元论蕴含自由主义吗？如果是，在何种意义上“蕴含”？或者，就像约翰·格雷主张的那样，多元论是否破坏了自由主义呢，至少作为给予人类最佳政治秩序的一种普遍性论题而言？或者，这两种立场是没有联系的？伯林就多元论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所发表的评论看起来最多是模棱两可的，^①这是他在书面上留下的、没有解决的主要难题之一。实际上，他从来没有认真而系统地郑重注意这个问题。所以，在这本书里对这个问题的点评，即使是时断时续的，也还是真正地引导我们前进的。

这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另外一个难题，亦即，是否存在着共同的人性这个问题。就这一问题，伯林似乎说出不连贯的言论，时而强调我们透过时间和穿越世界看到的文化的巨大多样性，时而坚持共享的核心需要和价值观，这一点使得我们能够和处于巨大文化或者历史距离之外的人感受到共鸣。在这里，这个难题没有得到解决，但是贝阿塔坚持澄清明显的矛盾，又一次得到了对问题的点拨。我实在极为希望她也催促他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他认为的价值观的客观性，是否应被视为指这些价值观得到广泛认可（他常用的表述），或者指其 10 对人类有益（这一点会允许我们放弃虽然无所不在，但是方向错误的价值观）。显然，这两个标准相互关联，但是准确地说，是怎样关联的呢？

读者可能感受到的沮丧之一来源于不幸的拖延：早在1958年，伯林就第一次明确宣告他的多元论，而其他对这一给人带来强烈搅扰的观点的持续研究在迟至三十年后才开始——部分可能是因为他以往零散的文章变成系列文集出版，其中有些文章对多元论有更多的叙述。这一理念的颠覆性意义为什么经过这样漫长的时间才启发了哲学家们？这依然是一个谜。贝阿塔适时引用了泰勒的话：

^① 参见下文第 82，211，287，290 页。

以赛亚的多元论论纲不仅对关于积极自由的各种极权主义理论是一个打击，而且也是令他自己圈子里那些占主导地位的道德理论深为不安的。我们知识界的悖论之一，将会日益得到讨论的是，后面这一点为什么没有被认识到？炸弹被放进学界，但没有爆炸。^①

无论有什么原因，现在肯定是的的确引爆了，而在这个时刻，多元论对于现代世界的意义要比1950年代末更大得多。的确，伯林的关键理念在今天的适用性，确实是围绕它展开的讨论颇具活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围绕对差异的适当宽容度界限而展开的全部议题——文化多元论、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文化帝国主义——都涉及多元论是否正确；如果正确，对于我们在特殊场合下的行动又具有什么含义。

在这一讨论充分展开的时候，伯林早已经退休，不再积极探索现在许多人所认为的对道德思想和政治思想的主要贡献。他对有关这个论题的不断膨胀的文献没有作出明显的补充。这一点使得那些希望他对1958年的简要论断作出澄清和扩展的人感到惋惜，因为聚光灯没有在当时照耀这个论题——亦即，在他更愿意、更有能力向前推进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问过他。在他阅读了有关这个论题的大量著述中一部分的时候，他是否感到想要横插进去，纠正那些误解他的人，裁决对立阐释者的争论，回答评论家的疑点，特别是约翰·格雷，因为这位作者的著作《以赛亚·伯林》把读者引向了其主题断然不会前去的方向。伯林回答说，已经发生的事，都是完全正常和自然的：有人发表自己的思想，接着，其他人使用这些思想，加以修改，加以批判，最后抛弃。对于误解和错误解释，他并未过分担忧——“我又能怎么办呢？”所以他宣布自己满足于听之任之。

这是贝阿塔遇到的两难处境。但是，她依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① 参见下文第266页。

她的耐心和坚持、她个人的优雅和道德的魅力、她的出身和背景、她明显的公正态度、她思路的清晰和直捷（完全不同于学术界及学术著述中常见的那种毫无必要的抽象推理和拐弯抹角的辩护）都一起发挥了作用，从伯林那里引发出不少有用的澄清和某些新的思想。自然，有时候体现出来的是需要某种解析的暗示；也有一些模糊不清、不连贯、模棱两可的情况^①和某种错谬。但是，我的预测是，作为一个整体，如果从某种同情的而不是挑剔的态度来看，这本书里记载的扩展讨论和各种解释，将被认为是对于我们对伯林思想之理解的持久而有价值的补充。

毫无疑问，在这部著作中，读者将会看到两位具有鲜明好意和善意的人士：一位是崇敬伯林的波兰青年女士和母亲，一位是年长的崇拜英国文化的俄国犹太人，他们一起探索的问题当中有许多的确是重要的，而他们探索的方式也必定会激励其他人继续展开这未完的对话。

^① 这样的情况大部分（但不是全部）来自本书中发表的言论的自发性质，为此，正如贝阿塔正确指出的，应该予以容许。但是，澄清依然值得作出。我来举出两个事例。

第一，伯林经常把“多元论”当作一个描述性的术语使用，用来指称他所相信的在某些价值观之间不可化解的不可比性；但是偶然地（参见下文第 202 页）他似乎又规定性地使用它，指称一种旨在鼓励追求多样不同价值的道德或政治论点。如果不牢记这一点，他的某些言论充其量是前后矛盾的。而且，在下文第 72 页，他把一种多元论和另外一种多元论混合：前者是一种信念，亦即，其他的道德可能和你自己的道德一样有效；而另外一种多元论则是和那些奉行不同于你的道德之人神交的能力。虽然伯林正确地相信我们不应该把现实简单化，但是也不应该看得不够简单，因此，某种更为准确定义的术语，带有这些或者其他的区分标志，对于他可能是有用的。对于伯林而言，“多元论”的这四个意义之中的第一个是首要的，其他的理想地说应该放弃或者避开。

第二，伯林经常坚持认为，使得不同世代和不同文化的人之间交流和理解成为可能的共有的人性，如他有时候所说是“准普遍的”（这个修饰词表示，无论有何等的普遍性存在，也都是临时性的，不是先定的）。但是，有时候，他显得要从他的这个可理解性基础上排除奇异的文化（参见下文第 222 页）——这是一种更审慎的立场，会破坏在我看来他更真实、考虑更细致和更有成果的关于人类精神交往程度可能性的观点。

他有时候陷入杂乱无章，但是，那是某种可尊敬的杂乱无章，因为每一个人都处于某种杂乱无章之中。

——斯蒂芬·卢克斯

题为“自由的价值：伯林的挑战”的一次会议发言
拉脱维亚，里加，1998年9月

对于我的著作，我没有看法，对于他人的著作亦然（笑）。都是言词，言词，言词。

——以赛亚·伯林

与贝阿塔·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的谈话
全灵学院，1991年10月13日

作者序言

15

贝阿塔·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

近几个月来，我意识到，伯林的思想大概是比以往更为活跃的。曾有一度，我们四个人都同时为这本书工作：伯林三十多年的编辑和最亲密的合作者亨利·哈代；宾夕法尼亚哈弗福德学院毕业生、论伯林犹太人身份的一篇最有趣论文的作者詹姆斯·查普尔；耶鲁大学毕业生、在牛津做关于伯林政治思想发展研究的乔舒亚·切尔尼斯；我自己。曾有一度，我们工作的紧张程度达到极点：当时我们有一台在佛罗里达工作的电脑停止运作，都好像是出于同情而罢工了。

本书要求高度团队工作的部分是我和伯林的谈话：这些谈话混乱至极、零碎至极、录音不良、难以听清。在这个团队的四个成员之中，有两个人对这粗糙资料的价值深表怀疑，这就是亨利和我。在有些时候，我们几乎要放弃，因为这个任务的困难令我们感到无能为力，还有恐惧，怕的是除了投入的工作量，到最后还损害了伯林。但是两位热爱伯林的青年人绝对深信不疑，我们应该继续工作。伯林逝世的时候，他们才十几岁，所以他们没有机会像我们一样亲自认识他。他们是年轻的美国人，是在不同的现实生活中长大的，没有经历伯林那英国的，或者斯拉夫的文化 and 历史背景。然而，还是他们生气

勃勃的兴趣和对于我们共同努力之用途抱有的青年人那种信心，使得我们完成了这项工作。

- 16 有一次，詹姆斯评论他对英国萨默塞特音乐节的印象，引用了我做的录音中伯林的一句话。我想：“就是为了这一句引用语，也是值得的。”伯林的话涉及波兰历史上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投票制度一票否决制（liberum veto），那句话是：“那是发疯，那是奇妙的。”

在一篇回忆录，《回忆以赛亚·伯林》中，我讲述了和这位已故哲学家长久的接触，回忆录是在他去世以后为《牛津杂志》写的，已经收入本书。这十四年的成果我都放在一个抽屉里面。包括他给我的二十封信，为波兰杂志做的两次访谈，我的几篇文章，和一堆过期的、老旧盒式录音带。在作出出版一本书的提议之后，我立即决定把伯林的全部书信和与回信有关的我的书信收入。伯林给我的书信都是简单的便笺，但是也有专门为我写的整篇的文章。这两类书信都颇多地讲述了写作者的性格。有些片段在今天看来，是具有预言意义的，例如在大约十年前写的一封信里有这样一个片段：

如果其他文化[……]威胁了我的文化，如果它们不仅和我的社会的价值观不相容，还积极设法破坏我的社会，那么——即使我可能完全理解是什么因素（在社会学上或者心理学上，或者宗教上）引导人们走向这样的信念——那我也要保护自己，抵御这些价值观，并且认为我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它们的确是危险的，威胁了作为我的社会存在基础的种种妥协的话，那么，我就可能不得不去攻击这另外一种文化，乃至参加战争。^①

我也收入这些采访原来的英语文本，以及（在某种意义上）对于

^① 1997年2月18日信，参见下文第85页。